

从环境与思想展望未来中国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研究〔I〕

山下睦男

目 录

内容提要

1 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1·1 问题意识

1·1·1 环境与思想的关系

1·2 问题意义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1·3·1 对中国认识的不足

1·3·2 按时间顺序进行环境分析的必要性及与“李约瑟之谜”的相遇

1·3·3 循环的扩大与中日比较的引入

1·4 研究概况

2 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观点的考察（以下次号）

2·1 前言

2·2 对不可解解明的接近

2·3 中国思想的原点

2·4 中国观中出现的两种形式

2·5 结束语

3 环境与思想的关系上的中日科学技术发展比较

3·1 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态度

3·2 西学传入中日两国及其命运

3·3 日本的殖产兴业与中国的洋务运动

3·4 其后的动向

- 3 · 4 · 1 日本的情况
- 3 · 4 · 2 中国的情况
- 4 环境与思想：科技与经济互动关系的背析
 - 4 · 1 世界最古的文明
 - 4 · 2 思想与科技的发展
 - 4 · 3 思想与科技的停滞
 - 4 · 3 · 1 对商业的蔑视观所带来的商业的落伍
 - 4 · 3 · 2 儒教与科技的关系
 - 4 · 3 · 3 中国人的自然观
 - 4 · 4 与日本的比较
- 5 基于四要素循环的现实经济发展战略
 - 5 · 1 从人治国向法治国家的彻底转变
 - 5 · 1 · 1 人民的意识改革
 - 5 · 1 · 2 三权分立的确立
 - 5 · 1 · 3 法的统一问题
 - 5 · 2 市场经济化的促进
 - 5 · 2 · 1 由量的扩大向质的提高的彻底转变
 - 5 · 2 · 2 质量安全保障机构的设立
 - 5 · 3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展开
 - 5 · 4 全球化思维的促进
 - 5 · 5 金融制度改革的实施
 - 5 · 6 提高法律、规章、政策的透明度，公开
 - 5 · 7 收入差距的纠正
- 6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内 容 提 要

本论文的要点为：李约瑟的功绩，即①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②为什么中国在14世纪之前其技术领先于西方（这便是“李约瑟之谜”）。

将这一问题与我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现在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他的二循环阶段论（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加以思想与经济上的阐述，从而形成四循环阶段论（环境→思想→科学技术→经济→环境）对“李约瑟之谜”做以明确地解答。对于问题①李约瑟不完整的回答给予完整的答案，同时在这些分析当中，进行了中日比较，提出了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方向。

并且，对问题①和②以及世界上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欠缺敲响了警钟，同时，说明了作为低级概念的“中国中心论”、“天命论”与高级概念的“家庭制度”紧密关系，同时同样分析阐述了与由此产生的中国人行为模式的关系以及1949年中国建国后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等对内对外经济政策与思想的关系，并提出了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转变这一今后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的政策等建议，以及入世后如何应对国际化的对策，考察了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经济的现状。

关键词：环境， 李约瑟之谜、中国中心论、天命论、儒教、家族制度、二要素循环模型、四要素循环模型、多因素循环模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人治国家、法治国家、科学技术、科学革命，经济发展，WTO,全球化

1 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1 · 1 问题意识

环境与科学、环境与经济、环境与生物以及环境与地理等等，环境不仅与社会科学关系密切，与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的关系也很紧密。从历史上看，环境与人的关系自有史以来，不管是否被强烈意识到，都必然地错综复杂地处于各种各样问题的中心。即换言之，人类的历史伴随着与环境的关系。

中国曾是 4 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创造出许多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但现在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此问题想从与环境的关系上加以研究说明。同时，2001 年 12 月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将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并且，2008 年，中国将举办奥运会。对于处于如此形势下的中国来说，要实现更大的飞跃式的发展，其改革的重点应是什么，对此问题，也想以其与科学技术史的关系为分析重点，并引入中日比较的方法，来考察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战略的要点。

1 · 1 · 1 环境与思想的关系

1) 环境的定义

根据大辞林（三省堂，1989 年 3 月）的解释，所谓环境是：“环绕于周围的世界。在人与生物的周围，对其意识及行动产生某种作用，以及其外界的状态。”⁽¹⁾ 大致区分的话，可分为二种，即生物出现于地球以前所存在的自然的周围状态即自然环境和人所创造出的周围的状态即社会环境。一方面自然环境规定了居住、生活于此的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此生活的人所创造的社会环境部分地改变了自然环境。也就是说，首先有自然环境的存在，它影响人的生活。相反，人所创造的文明及文化随着它的发展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影响。

总之，首先有自然环境的存在，继而人创造了社会环境，社会环境也给予最初的自然环境以很强的影响，两者相互影响而存在。

布拉修[5]这样说道：“人类的社会集团与植物和动物的社会集团相同，以服从环境影响的诸多要素而组成。他们是以何种方式集中在一起、从何处而来、是何时期才形成这样的，这些无从而知，但他们同住一国土，并逐渐地具有该国土

的特色。”^{〔2〕}这便是有名的“环境决定论轮”。

任何国家的人都深受其历史的、地理的环境影响而形成其思想。因而，各国家的人的思想是最适合其各自环境的形式而产生、发展的，别人无疑没有一点评价的余地。

基于这种观点，和辻氏〔22〕将风土和人结合在一起，把各个民族归纳成季节风型、沙漠型及牧场型，把中国及日本的思想做为季节风型风土的特殊形态加以分析^{〔3〕}。另外，李约瑟〔2〕、〔6〕、〔7〕、〔9〕从科学技术与环境的关系上来分析中国民族。

中国在诸多领域中最先发明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技术，而后来为什么没有发展呢？对此问题的解答，如前所述，李约瑟以难以想像的大量丰富的资料为基础得出的结论便是，由环境产生的东西相反也会由环境阻碍其成长。其详细内容留待后述。

这样由环境产生了思想。那么，在中国由于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了怎么样的思想将是下一个重要问题。

2) 环境与中国思想

中国有辽阔的国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中国，由于环境的影响产生了什么样的思想将是下个问题。

如前所述，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正因为具有优越的条件，所以才理所当然地成为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因此也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受此强烈影响的独特的思想。

但是，中国的国土面积约是日本的25倍，并且又是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具有“地大物博”的优越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可以想像出不只是单纯地出现一、二个思想，而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由于自古以来皇帝权力的强大，以及为监督众多劳动者而产生了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只不过是整个中国中的一小部分。官僚主义这一侧面与处于官僚统治下的一般群众之间都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思想，这也是毫不为奇的。

那么，下面论述一下位于这些各种思想顶点的、一般认为是中国的两个基本思想。

3) 复杂的中国思想与基本思想

中国人的基本观点，正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句话所反映的那样有多种多样，并且其分类方法也有无数种。但其中最基本的思想可以说有二种，即“中国中心论”和“天命论”。

所谓“中国中心论”，众所周知就是认为中国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作为其自然的发展趋势而扩展到世界各地这样一种王者思想。

在具有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中国产生这种观点正如后面所述的那样通过其历史的、地理的背景及过程看的话是容易理解的。

但是，如前所述，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思想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小部分人与大多数人（一般大众）及“上意下达”这样独特的情况下，如下图所示与统治者之间产生的。我们应注意这种未反映民意的单方的两者关系。

另外，“天命论”即认为权力的交替、秩序原理及命运等等都是天、即自然所为，是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产生的一大思想，可以说它是与“中国中心论”相对应的一个思想。

如前所述，在中国古代，是一小部分握有权力的统治者向大多数的一般人民发号施令。倾听一般大众的意见（民意），即使形式上存在而实际上是决不会有的，而是完全的单方的“上意下达”的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一般大众能保住自身（包括家庭成员）已是不易了。与政治相关的话题岂止讳莫如深，有时会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们不得不“莫谈国事”，从而产生顺从强者的“事大主义”观点。

关于权力的交替，他们更是不感兴趣，因而产生出权力的交替是天命的变化这样的“易姓革命”的语言来。长期以来。这种典型的利己主义的天命论深深扎根于一般大众的思想之中。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中心论”与“天命论”已成为了复杂多样的诸多思想中的基本思想。

下面谈一下“中国中心论”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其解释及适用虽有某种程度的差别，但经常处于政策的中心位置，这是因为受到“中国中心论”强烈的

影响。

因而，需要通过对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大政策基调的分析，来考察一下一些弹性变化所带来的中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

4) 基本思想的三方向展开

这种传统的大思想做为基点，产生出了许多具体的各具特性的思想。其基本内容，有现实主义的，有理想主义的，有超越主义的，但构成其中心的一般认为是现实主义的立场⁽⁴⁾。即，基本上在各方面满足的情况下，既没有必要去梦想，也没有必要去超越现实，只要正视现实生活就足够了。

当然毫无疑问，通过中国所处历史过程的变化，表面上理想主义与超越主义的思想无论时代的还是部分的一般被予以接受了。即，现实主义的思想被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法家，孙子、吴子等兵家，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甚至毛泽东等共产主义所继承，正如“实事求是”这句话那样一直继承到今天。

另外，理想主义思想由孔子、孟子、朱子、王阳明等儒家，超越主义思想由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所继承去的为个别思想。⁽⁵⁾

在维持其基本思想的同时，根据情况发生各样变化的是个别思想。

这里应注意的是，看上去是各自分离的思想，但实际上其中贯穿着共同的“家族主义”这一大原则。

林语堂曾这样说道：“中国的家族制度组织得非常明了，可以让你忘不了你所属的家系。中国人比所有财产更认为为尊贵的这种社会不灭的形态有几分宗教的色彩，祭拜祖先的仪式更增添了其宗教色彩，其意识已深深地渗透到灵魂中了。”⁽⁶⁾

另外还指出：“忍耐是由于人口过剩和经济压迫几乎不留有活动余地带来的民族调整的结果，特别是中国社会缩影的家族制度的归结。”⁽⁷⁾

就是说，家族主义中存在着“中国中心论”与“天命论”。林语堂还指出：“家族制度是中华社会的根基，中国人的一切社会特征皆源于此。”⁽⁸⁾

另一方面，“易姓革命”、“莫谈国事”产生于“天命论”，因此，“没有”、“没关系”、“不知道”、“没办法”及“不一定”这样的话至今仍在使使用。同时，做为统治者思想的儒教所推崇的“五伦”也是家族关系。中国人将自己国家称之为“中庸之国”，如此受中国人重视的“中庸”便是现实主义，如奥格·兰古

所说,“差不多”即妥协解决所有冲突⁽⁹⁾。

5) 与日本的比较

中村氏〔17〕曾指出:“中国人与印度人相反,具有无视普遍者,注意个体或特殊者的倾向。特别是依靠直觉重视具体的知觉。首先,文学是象形文字,是具体的,关于概念也爱好具体的表现。既使理论性的说明,也喜欢依靠知觉表象,进行图示说明。相反,缺乏对普遍的自觉,抽象思维不发达。言语表现及思维性格是非论理的,缺乏法则性的理解,只满足于依靠先例。印度论理学(因明)也是畸形地把它接受过来,佛教作为禅宗而大众化,变成极为非论理的东西。因为重视个别性,所以个性记述的学问(历史、地志等)很发达。一般重视过去的事实,有尚古的保守性,数千年持续同一思维方法。学问也是传承的,自由思想没有多大发展。另外,中国人爱好符合具体形态的复杂的多样性,艺术的想像也是具体的,喜好用修饰文字的表现,有训诂癖。并喜好简单的形式上的齐合制。生活形态是现实主义的。特别是由于有以人为中心的态度,所以宗教也是现世中心的,没有发展形而上学。个人中心主义有时以利己主义的倾向表现出来。虽然一般认为中国思想是伦理的,有重视行为上的形式主义,至少在过去,有注重身分差别及家族关系的倾向。中国人有民族的自尊心,尊重来由,但并不一定总是国家中心主义。而是顺从自然本性,归于自然,注重天人相关的关系。对于存在的东西,承认其各自的意义,容易折衷融合的倾向极强。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依靠儒教,一般民众依靠道教及其它咒术仪礼,但两者都没有脱离以上特征。既使从印度传入了佛教,也是自然而然变化成具有以上的特征。”⁽¹⁰⁾

这是从比较思想的立场上进行的分析,无疑应当注意没有加入任何价值判断。从比较思想的立场上进行分析,如果借用中村氏的话说,日本的思想是这样的:因为重视闭关的人伦组织,所以一般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承认人际关系对个人的优越,崇尚有限的人伦组织。这从历史上看的话,如家庭道德的尊重、等级身份关系的重视、直到国家至上主义。

并且,在日本人中间,由于对特定个人的绝对归依态度显著,所以国家至上主义也是以崇拜天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另外,宗教的、派系的闭关性显著,为了保护一旦形成的人伦组织,既使付诸

武力也在所不辞，这与武勇的态度是一致的。

由于重视人伦组织，所以道德的反省比较敏锐，但由于不愿考虑超人的东西，所以极其缺乏对宗教尊贵的自觉。

而且，日本思想是非合理主义的，直观的、情绪的倾向较强了，缺乏组成复杂表象的能力，喜好单纯的、象征的表象。由于缺乏有关客观秩序的知识，所以未能发展自然科学。并且是现世主义的，承认人的自然性情，富有宽容精神，接受文化的多重性，但相反，对立批判的精神薄弱，容易陷入妥协。

日本人也引进了佛教及儒学，但决不是照搬引进，而是按照日本人的思维方法改变了实质内容^{〔1〕}。以上从比较思想的立场上，分别列出了日本思想及中国思想的特征，另外，比如还可以举出与中国的“中国中心论”相似的“八紘一宇”思想。

所谓“八紘一宇”的八紘表示天下的意思，一宇表示一个宇宙的意思，即世界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这与中国的“中国中心论”有极相似的一面，但从其历史性、强大程度等侧面看的话，都无法与“中国中心论”相提并论。

同时，这里应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国的“中国中心论”还是日本的“八紘一宇”思想，虽然都具有各自的特征，但决不能认为其他国家就没有类似的思想。我认为，虽然程度不同，所有国家都有本国是最出色的思想。但重要的是，虽然各国都有（程度不同而已），但中国的“中国中心论”无论是历史侧面还是渗透程度等等从所有角度看，都可以说是极其突出。

另外，“天命论”也与“中国中心论”同样，比如虽然是与美国实用主义相通的现实主义思想，但我认为与“中国中心论”相同，无论从历史性，还是渗透程度上看，美国的实用主义都无法与“天命论”相比。

与中国相比，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小岛国家，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25分之1，因此，人们都如同散沙一样生活的话，国家就会灭亡，正是出于这种情况的考虑，才具有了尽可能控制利己主义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这是当然的归结。

6) “中国中心论”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

(1)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经常作为中国对内对外的基本方针提出来。这句话是

由毛主席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与我们的方针”中及1967年、1969年的《红旗》杂志中这样提出来的，即“我们的方针应以什么为基础，应以我们自己的力量为基础，这就是自力更生。”⁽¹²⁾ 并且反复提出：“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破迷信，解放思想。”⁽¹³⁾

这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从以前中国的历史上看也可以清楚地知道，其解释及适用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弹性，中国过去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正是按照这一点而发生转变的。出于这种意义，如果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两个极端的、即狭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广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这一观点上的话，我想可以说明过去中国的一些重大政策的转变。

(2) 狭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如果从极端狭义上阐述的话便是个人(Individual)，但是，这种观点即使思维上存在，但在政策上、在过去中国历史上并未有过，并且也不可能有。因为个人是无法生活的，只有在社会当中人(Human Being)才可从生存。

即使假设这种情况得以存在，也如凯恩斯[43]指出的那样只不过是利己主义(Egoism)，这当然

与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中国相矛盾。⁽¹⁴⁾

当然，如前所述，吴承昭[38]曾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大而全、小而全”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后面所叙述的政策上的严重矛盾与困难。⁽¹⁵⁾

从而，即使是狭义的解释，其中包含的基本内容可以理解为毛主席的如下主张，即“学习有二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即不管我国国情，适用不适用的都照搬进来，这是一种不好的态度。

另一种态度是开动脑筋，学习适合我国国情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种态度。”⁽¹⁶⁾

(3) 广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

如前所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从极端的狭义意义上看并不存在，但做为其接近的方针表现在政策上面的话，便会产生严重的矛盾和问题。“文化大革命”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靠极端的精神主义人类是不可能长期生存的。⁽¹⁷⁾

提出许多高计划和高目标,而又不断地变更和“调整”⁽¹⁸⁾,这对中国人民来说,主观上提高生活水平的意识渐渐淡化,这样当然势必要改变政策。做为这种状况的表现,过去一些对内经济政策上的转变也都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在与其制约的斗争基础上得以实现。

在中国,既使实现了自由化也决不是整体的,而只能是局部的,不然,做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便没有立足之地。

因此,当脱离一定许可范围的状况渐渐表露出来时,便会相反突然出现一次大的向左摇摆 (Left Swing) 现象。中国历史已经经历了几次这样大大小小的摇摆 (Swing)。

但是,从中国过去历史上分析,其摇摆决不是左右对称的。有时虽然向左摇摆很大,但从整体的观点看轨迹的话,与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还是摇向右的倾向大。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具有独特的要素,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缘故。

(4)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起源

中国是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无论文化上还是技术上都具有比其它国家相当优秀的素质,可为什么现在主观客观上都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上呢。

对此问题,爱克斯坦[12]通过对欧洲及日本和中国的比较例证得出了以下解答,即欧洲与日本、中国决定性的差异在于科学革命与科学的累积进步、外贸的发展与自治城市的成长,而日本和中国,虽然相同点很多,但两国的地形与政府结构不同⁽¹⁹⁾。

但对日本和中国差异的根本原因,爱克斯坦指出:“其理由极其复杂,很难把握。两国经济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差异,这某种重要差异水平可以说明两国发展途径的显著不同。”⁽²⁰⁾ 这表明他无法解明这个问题。

不管是否由于爱克斯坦[12]所说的这两种情况,对此问题的解答最终完全可以由环境产生了“中国中心论”和“天命论”⁽²¹⁾。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促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明,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也促使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停滞这一方面加以说明。其详细内容留待后章说明。

并且，我认为，这两种思想中，“中国中心论”才是真正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起源。即从发展史上看，中国自古以来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文化上技术上都凌驾于别国之上，具有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是卓越的、实质的世界经济中枢，在世界上享有王者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具有别人学自己的优越感，而不愿意向别人学习。

另外，中国在具有先进的技术知识的同时，也向卢梭一样敬畏自然本来的姿态，不愿加以改造。

前者可谓是“中国中心论”，后者则是“天命论”。用爱克斯坦引自R·H托尼的话来说，由于这种难以侵犯的思想铁壁，中国的农民在“欧洲使用木制工具时就用铁耕作，可当欧洲人使用钢时却依然用铁耕作”⁽²²⁾。

（5）狭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政策应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²³⁾。中国在“向苏一边倒”⁽²⁴⁾的方针下，从1953年开始着手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时期的中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指针可以从狭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观点去考察。因为，从1950年的朝鲜战争开始，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国人民当然热切地要摆脱旧中国半殖民地的经济体制，但苏联早就与中国有较深的关系，中国又要实现自主的经济建设，正是出于这种判断，中国才能够接受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这是狭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

当然，这种情况对日本是极其严峻的，但由于日本民间层的不懈努力，1952年签定了“第一次中日贸易协定”。其后到1958年“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签定为止，中日贸易一直接中国的情况进展。

狭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极其严格地应用于政策上面可以说是由于1965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即1959年由于中苏意见对立的激化，中国开始与资本主义各国进行多角接触，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其以前的方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由于“文化大革命”，这种倾向被作为崇洋媚外思想受到严厉的批判，中国国内也一时与国际经济隔绝起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

（6）广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政策应用

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 1949 年至 1952 年的经济恢复期、1953 年至 1957 年的经济建设期后,到了 1958 年、1959 年进入了大跃进时期,“共产风”在“一平二调”⁽²⁵⁾的方针下凶猛地刮了起来,狭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在这一时期得以应用。但是,由于 1959 年开始的中苏关系的恶化、六十年代初大跃进政策的纠正以及有史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不得不修改政策,开始将广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应用其政策上。1961 年后,中国开始加强了与除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²⁶⁾,并开始从加拿大、澳大利亚及阿根廷等非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粮食。

做为这种中国对外政策的反映,虽然仍存在着对日政治三原则(即①停止敌视中国的政策。②不参予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③不妨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对日贸易三原则(即①有必要政府间签一项协定,规定无政府保证的民间贸易协定无意义。②无协定期间,如果条件成熟,可以签订民间协定。③中小企业如有特别困难,由总评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助解决。)这种对日方严峻的局面随着世界经济形势逐渐走向东西贸易缓和,中日贸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广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最明确地体现在政策上面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 1969 年以后,其倾向在最近特别显著⁽²⁷⁾。即对外方面,从 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开始,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同年中日实现正常邦交,1979 年中美实现正常邦交,在这种开放的对外姿态背景下,制定了合资法,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的扩大、补偿贸易方式及委托加工贸易方式。同时,对内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引入“市场机制”,恢复“劳动合同制”等等⁽²⁸⁾。

中国的这种广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当然也给中日贸易带来了好的影响。尽管有做为 1970 年对日贸易三原则的补充、内容仍然严厉的“周四条件”,1967 年及 1975 年虽然出现短暂的减少,但中日贸易 1972 年比前一年增长了 22%,1973 年增长了 83%,其后直到现在,中日贸易都呈显著飞跃增长趋势,1980 年贸易额达到了中日贸易史上最高记录。

历史上存在于中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中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做为表面的反映,有时是狭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有时又是广义“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政策,应用于现实中。

即使有一个中立的政策,中国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也总是以其为标准左右摇摆。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现在广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由于最近的“调整”政策也受一定影响。从以上议论可以清楚地看到,广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决不会由于某种“Flash Over Point”(爆发点)而独自进行下去。

因为中国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通过上面所述可以清楚地知道对理解中国是密不可少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研究中国今后对内对外经济政策时,不能忘记中国固有的“中国中心论”派生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这对我们来说也许是有必要的吧。

不然的话,研究者将不得不经常变更、修改自己的观点,或许最终对此付出的努力也将变成徒劳,其成果也将是沙中楼阁吧。

如前所述,50年代前半期中国曾从前苏联借过款,这是毛泽东的政策“向苏一边倒”的反映。

但是,随着进口所带来的外汇缺乏对中国政府来说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因而,借款的定义便成为问题,即按以前的定义,所谓借款是:(1)、成套设备进口的费用支付。(2)、民间资本的借入。(3)、政府间贷款这三种。采取狭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的中国政府将(1)作为商业习惯的一部分予以接受,其他的一概予以拒绝。

但从1977年后半年开始,中国表示了自建国以来的新决定,即接受资本主义各国的所有贷款。

1977年,中国还做出了更加惊人的决定,即允许外国资本的进入,也就是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路线”。而在这以前,中国甚至不允许在国内设立私营企业。

真正引进外资是从1979年开始的。

当然,此间对于借款的定义的各种争论并未停止过。例如(1)借款符合“自力更生”吗?(2)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前的百多年耻辱的近代史不都与借款有关吗?等等。结果,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发政策”的根本转变。

但这种根本转变也是由邓小平1978年“南巡讲话”所带来的,这与以前由最高

领导人一声号令的做法是一样的。但社会主义中国也不是铁板一块，现在的对外路线也许会被改变（即使现在这种可能性几乎百分之百不可能），极左势力的抬头今后也应随时注意。

1·2 问题意义

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一直持续在百分之九左右，但是，其原动力的出口企业（外资企业产品占出口总额的出口额，95年为31.5%，2001年上半年突破了50%）⁽²⁹⁾为外资企业。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不仅制造业，对于外资参与服务业的条件也将渐渐放宽，中国将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的市场。

为了与这些外资企业竞争，与其并驾齐驱，现在已经普遍出现了“竞争上岗”、“马上行动”的现象。我确信，本论文将会对这种现象的推广，以及中国以外的其它的发展中国家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1·3·1 对中国认识的不足

本研究的出发点极其简单。那是因为，有关中国有所有问题（以下简称“中国问题”），世界上许多的研究者至今为止做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在阅读这些研究成果过程中，我注意一些共同点。

这些共同点是：①他们确实从各种角度进行了研究，但经常出现同一研究者并未得出同一结论这样一种现象。②经常将中国认为是不可理解的国家。③极其缺乏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you attitude）的姿态。

具体讲的话，比如第①点，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总是不考虑中国政治家讲话的背景，直观地去理解其讲话，从而产生错觉。

其结果，总是将几个讲话串连在一起叙述历史⁽³⁰⁾。

野村氏曾说过：“我们的观念之中，感情上的亚洲观、对中国感情上的亲近感确实具有潜在的力量。在日本，热心研究中国问题也还是出自这种意识、这种感情。无论是保守党还是革新派都具有这种意识和感情，并在现实中起作用……但我们在继承这一遗产的同时，必须将其革新，将现代中国置于世界之中，并对此

付与我们自身的意义。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使我们回归过去将中国问题纳入感情色彩亚洲观的最有意义的尝试，也是创造我们自己中国观的有意义的尝试。”⁽³¹⁾ 野村氏在这里阐明了新的中国认识观，但在另一次机会，他在谈到文革后初次访华三周印象时说：文革再次否定了王朝权力在现代的翻版，更加加强了人民权力的基础，初步取得了完全的成功⁽³²⁾。这里面存在着与①类似的问题。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经济体制下长达100年之久（45年至新中国建国的4年间，发生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战，把这段时间算在内的话，国内动荡的实际时间长达109年）。

这里不容忽视的重要事实是中国国内长这100多年之久的动荡时期，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一粒沙子”的宿命吧。

要治愈这“心灵上的创伤”（PTSD），据说要花费与此相比更长的时间，即使最短的治疗时间也得到2058年，从现在（2003年）算起的话，还有55年时间，并且，“文革10年”（这是中国政府发表的时间，我个人认为时间上还要长一些）也算在内的话（我个人认为应当做为“心灵上的创伤”算在内，治愈这种“心灵上的创伤”要到2068年）。

总之，这里想要说的是，对于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的评价最少需要10以上时间。并且，如果慎重考虑的话，（我认为应该这样做）则需要40年及50年以上的的时间。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如上面所述简单地得出结论的倾向，正因为如此，其主张才不得不几度变化。

例如，贝冢氏这样说到：“历史学家必须避免来自于沉默的论证（傍点为笔者所加）。就是说，决不能因为某一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没有出现在该时代的记录上，或者说史料对此保持了沉默，便立刻推论在历史上没有发生此事。史料保持沉默；只能是一个没有发生此事的消极证据。在没有出现发生此事的积极证据之前，历史学家必须停留在大概没有发生此事的推测阶段上。”⁽³³⁾

巴特费路德也说过：“其实我所了解到的表面的中国都是从西欧人写的文章上，这些文章都是他们访问中国二、三周后急匆匆写出的。只去几个专为外国人访问中国准备的，即官办的专为旅游观光用的几个城市和人民公社这样一个无形的点线上看看，他们回国后便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没有犯罪、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失

业。”⁽³⁴⁾当然，“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做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那种简单、缺乏慎重的观点在逐步减少，但需要指出的是，努力去辨清真实⁽³⁵⁾，并且保持脚踏实地的、慎重的态度无疑是最重要的。

下面，再谈一下中国观中常见的两种形式。

一般其中存在着好意的和恶意的两种见解，两者都有一定的偏见性，尤其后者其程度其更甚。前者多见于西方人及现在的日本人，后者则多见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

在这里，我们特别看一下成为问题的后者的情况。比如，津田氏[19]、[20]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人最精于治人之道，他们研究以人治人之策，并宣扬教授之。其成为注意之焦点便是中国思想的特色……这不仅不适用于其他民族，并且做为思想来理解对于中国人以外的民族来说也非常困难。他们没有批判精神及其能力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论理的头脑及正视现实、揭露事物本质的能力。……当然，日本至今仍使用汉字，做为文字，它极为低级，极大地阻碍文化的发展，并且其本质也不适于书写日语。但尽管如此，至少其一半还是使用日本固有的文字，因此与中国人使用汉语时的汉字在用法上是不同的。”⁽³⁶⁾

并且，和辻氏[22]也曾这样批评过中国思想：“我们不能轻视这种性格的差异。中国人是一个全然不懂生活艺术化的实际国民，而日本人是一个过于生活艺术化的非实际国民。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比犹太人还犹太人，与此相比，日本人则比希腊人更希腊人。日本人失掉其团结，站在个人的立场上与中国人对峙的话，日本人决不是中国人的敌手。并且中国人的取胜对人性来说是一个退步。”⁽³⁷⁾

另外，福泽氏[26]虽然语气上比津田氏与和辻氏弱些，也强调中国人无知、不明世故，日本决不能效仿之⁽³⁸⁾。

这些一般为人所知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的评论当然与当时日本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关，但对此决不能容忍。

我们应当知道，当时日本所处的历史背景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受各资本主义列强国家所侵略。日本也与中国相敌对，并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其结果，在日本产生这样的思潮，即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今后日本重要的是学习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也就是说，由于“脱亚入欧”这种观念，产生

了前面那种评论。

同时，也要注意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只把他们看作为一般所说的那种对中国持有偏见的代表人物。因为，象津田氏除了偏见的主观以外，相当的部分都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辻氏也同样，如果看一下他的初稿和修订稿，就会惊奇地发现其差异⁽³⁹⁾。

象巴特费尔德那种持有恶意偏见的西洋人较少，一般都是好意的。例如艾得勒在其序文中给斯大林提出的俄罗斯的勤劳和美国的效率这二个共产主义建设条件又加了一条，即中国的忍耐，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表示了乐观态度⁽⁴⁰⁾。

费尔班克[8]曾指出考察“中国问题”的重要性⁽⁴¹⁾。爱克斯坦[12]也认为中国要完成现代经济增长的课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主张以热情的目光对待之的宽容性⁽⁴²⁾，这是极有意义的观点。因为，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53年看成为仅仅的53年和看成为已经经过了53年，其观点自然会完全发生变化⁽⁴³⁾。

正如前面所述那样，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动荡时期。如果把这段历史时期（包括1966年至1976年文革的10年时间）考虑在内的话，看成为仅仅的53年当然是不妥当的。

当然，一时的所谓中国热式的观点也应该排除在外。

重要的是应该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以特别的眼光看待之。要看日本就有必要看中国，因此，考察中国或中国人的历史无疑是必要的。

正如李约瑟[2]、[6]、[7]及[9]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国的贡献，也许便不会有我们文明的进步。因为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及指南针，欧洲封建制度的消灭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如果对环境条件加以充分说明的话，欧洲人发展近代科学和近代技术本身也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

如前所述，能力哪儿都有，但与其相适应的条件并非哪儿都有。努力懂得这个道理才是重要的。

下面看一下第2个问题，即将中国称之为不可理解的国家这一问题。一般地说，不是研究中国具体表现形式的人，其倾向就越严重。

阿色米勒这样说道：“我的教训是，如果不能轻易区分真假矛盾的话，要想理解（傍点为笔者所加）一个国家是谁也无法想像的。只要仍然盯住中国人并不

以为是问题的事情，甚至对此事感到惊讶的话，说明我们并没有理解中国。”^{〔44〕}

当然，如米勒所指出的那样，相反对某些特定的人来说，有必要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惊讶，这也是事实^{〔45〕}。

但是，这里重要的是，即使实质上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或者中国人本身，也可事先在可能的范围内去理解，或者要有去理解的积极态度。

决不要忘记，不用深入考虑的方法去考察作为具体表现的中国对内对外活动将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已经说过。浅薄的、随意就事的评价必然要经常得到重大的纠正，评价者的能力也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要解明中国的不可理解，最重要的是努力获得正确的认识和慎重的态度，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那么，首先基本地应该了解什么将是下一个问题。

根岸氏就买办制度的研究这样说道：“研究买办制度，而不探讨买办的性格几乎习以为常。这也许是研究性质上的不得已。但在中国，不是靠制度而靠人变化的。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从属的。买办制度也是以买办为主，制度从属。因此，研究买办的制度而不探讨其性格如同研究了人的皮肉骨骼五脏，而忽视了精神。无数的日本人花费漫长的岁月研究中国，应当是把中国的各方面都研究透了。但每当发生一个事件，却又往往判断失误，以致失去处置的时机。这毕竟是只研究中国的事实，而探讨中国人太少的结果。要研究中国，归根结底要研究中国人。”^{〔46〕}

也就是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是研究中国人。

研究中国人，可分为肉体研究和精神研究，其中具有意义的当然是精神研究，即思想研究。不光是中国思想的研究家，对于其它问题的中国研究家来说，研究中国思想这一基本认识也很有必要。

中国思想的研究与研究其它思想一样困难。正如津田氏指出的那样：“中国思想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观点，既复杂又是多方面的，并且，思想根据阶级、人的地位及观点等不同而不同。就算能够概括出一个统一思想，而在实际主张中，常常根据其人的心理和心情带有各种色彩与差异表现出来。所以，只取一面，就断定这是中国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另一方面，只根据书中少数知识阶级的思想来把握中国思想也有很大问题，因为民众不识字。

正如津田氏指出的那样：研究中国思想有很多困难，但在进行中国研究或中国人研究时，能以理解和整理百家争鸣以后极其复杂的思想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点为问题点，并能涉及以前中国思想的原点，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为其基本认识，可以说与研究所有思想所要求的态度一样，即决不能带有任何偏见。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存在的任何思想，当然都有其背景和存在的意义，不允许加入任何价值判断。假如做了这样的价值判断，映在虚伪镜子上的自己也同样是虚伪的模样，决不会产生任何成果。

虽然思想的比较对象是可能的，但对评价本身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下判断，并且也不允许下判断。

下面谈一下第3点缺乏“you attitude”即缺乏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姿态这一问题。

赵思希说道：“贸易与文明的趋势一般来说是从东洋向西洋转移。文明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尼罗河向地中海，继而向大西洋发展，现在正向太平洋、向西移动，太平洋正在快速成为人类关心的中心和商业活动的中心。在太平洋时代拉开序幕的同时，我们看到了远东的觉醒，特别是拥有四亿（镑点为笔者所加）人口和丰富自然资源的中国已成为整个形势的关键。位于东方的这个国家已发生了几个巨大的变化，而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国家所拥有的重要性。”⁽⁴⁷⁾

这是200年前在美国的中国人所著《中国之外国贸易》一书中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这无疑是说明当时世界形势与中国所处的地位，但这句话难道不是与现在的状况完全吻合吗？

作者在指出中国在世界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说道：“世界人民应当更好地了解中国。因为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民那样受到误解的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写的东西即使有也寥寥无几。外国人所著的书几乎都没有公平地对待中国人民……他们不是为了中国人本身的利益，而是为了促进外国人的关心与利益，来告诉我们中国应该这样或那样。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作者都是有意识地那样做。因为，有的情况下，是由于看不见奖章另一面这种偏见所为。但是，以前对待中国人的这种所作所为却仍然带有效力延续着。由于这种对待中国人民的错误观点，其结果造成了全世界人民，甚至中国国内误用泛滥的情况……产生了无数对中国

人的误解，几乎所有这些至今依然存在。清除它们是可能的，并且，我认为应该到了清除它们的时候了……外国人真心地理解中国人民，并努力去公平对待他们，这才是让中国人民更正确理解外国人的唯一方法……中国人民对欧洲人初期的驱逐政策正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先驱者们可悲的行为所致。这一点如果西方人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不会谴责中国人民吧。如果西方人知道英国人是如何得到英国政府的援助，强制中国接受鸦片的毒害的话，他们就不会因为鸦片战争而谴责中国吧。由于外国人长期对无辜人民的侮辱与侵略，其结果发生了义和团之乱，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事实的话，还会对此谴责中国人民吗？并且，他们如果知道中国的停滞不前大多由于外国势力靠武力在中国获得的利己且分裂的条约政策的话，还会对此振振有词地进行谴责吗？”^{〔46〕} 对此我认为完全正确。

一般而言，人都有利己主义的倾向，以自己、或自己的国家为标准（尺度）来考虑他人或别国的倾向较强。这种倾向不改变的话，便不可能理解他人或别国。

如前所述，完全成为他人是不可能的，但应当尽可能地站在他人的立场上以更客观的观点考察问题，这是专家所应具备，不然便不会看到真实的东西。

“you attitude”这句话本身是贸易英语中使用的术语，即要求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书写函电内容，这样才可能保持贸易关系的长期性。

虽然是贸易英语中使用的术语，但我认为这是所有人们行动准则的极其重要的一大原则，可这一点却经常被忘记。为了克服易于流向主观的倾向，因而有意识地在这里强调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求研究者的是了解分析的对象。例如，某国的制度是其国家的人所制定的，单纯一味地研究其制度本身的话，其结果将无法了解真实的东西。

只有了解了制定其本国家制度的人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了解了在这些环境下生活的人，才能够抓住真相。

1·3·2 按时间顺序进行环境分析的必要性及与“李约瑟之谜”的相遇

促使我进行（一）对中国认识的不足这一研究的是前面所得到的根岸氏，他是在日本最先研究买办制度的研究者。而直接促使我进行本题目研究的则是李约瑟。

无疑李约瑟以其大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而闻名世界。他写此书的动机是想让那些对中国科学传统无知的西方人了解中国科学的存在，为了给西方人以深刻印象，在书中，他论证了许多中国的发明和发现都早于西方。

从此以后，在西方以前将希腊以来的西方科学史称之为“科学史”中引入了中国的科学史，称之为“西方科学史”，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⁴⁹⁾。

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史之初，首先提出了第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在14世纪以前，其技术领先于西方？”这样的问题。后来世人将这两个问题称之为“李约瑟之谜”⁽⁵⁰⁾。

对于李约瑟之谜的解答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是李约瑟第一个问题。

李约瑟曾这样下结论说：由环境产生的东西相反也会由于环境而阻碍其发展⁽⁵¹⁾。以下做一下具体说明，即：李约瑟从降雨量的差异上对欧洲和中国进行了比较。中国的情况是：①有必要早期进行大规模的灌溉事业→河川管理的发达→需要数百万的劳动者→需要大批管理劳动者的官僚→中央集权化→国家权力的增大，②大陆式的特点→容易形成地区网状组织→文官权力的增大→商人的无权力化→官僚封建社会的形成，③灌溉→农业文明→商人的无力化。另一方面，欧洲的情况，李约瑟以以下形式加以说明：由于水陆分布情况①商业城市国家的发达，②技术的发展与商人阶级权力化紧密相连，③文明进一步发展，更强有力地确立了商人的地位。两者的不同点在于由环境所产生的官僚封建社会和商人地位。

本研究更进一步列出了一些李约瑟没有论及到的内容，比如，本研究中，将历史上的对商业的蔑视观、以理非曲直为判断善恶标准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的自然观都做为15世纪后中国科学技术停滞的主要原因来加以说明。

1·3·3 循环的扩大与中日比较的引入

以上是李约瑟的循环论，即环境→科学技术→环境。本研究中，在这个循环中加入了思想与经济，从而以环境→思想→科学技术→经济→环境这样的循环来考察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

图 1. 1

2要素循环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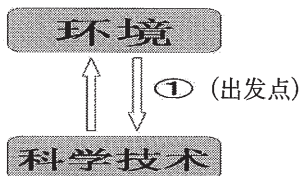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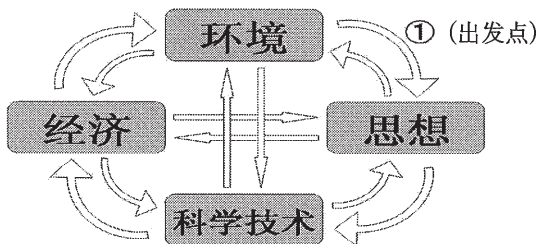


图 1. 2

4要素循环模型



第一图是理论之间的发展与环境 and 科技李约瑟的关系，不以为我叫两个元素组成的流通模式，第二图，在李约瑟，在另外两个因素环流模式我由 4 元环流模式有两个要素。

劉老師〔46〕指出如下。即「在16世纪中叶开始，第一次科学革命《1543年～1755年》，由英国建工艺品厂推广旁边出现最快的人很多纺织和机械发明，第一次技术革命《1733年～1823年》组成，除了第一个是由一个大的工业机器的特点之一，之后发生爆炸的第一次产业革命。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转型过程中，主要是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同步两

次科学正经历着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转型期的波浪。相反，如果这两个转换程度周期波的主要特征，同样的科学革命，属于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为此，由于技术已导致蒸汽的技术基础，推动科学和力学所有。

在第二次科学革命《1755年~1895年》和科技革命《1823年~1903年》通过促进，在电磁理论和电子技术的基础上，主要特点是电气工业第二次产业革命《1880年~1940年》年发生。这是科学的主要发源地，英国，以及技术的主要发源地和产业化是德国，然后是欧洲，开始在北美的传播和世界各地。

微观物理学导致以下第三次科学革命《1895年~1953年》和电子技术，一份关于空间技术和核能技术革命以下第三次技术革命《1903年~1970年》促进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人类社会，电子时代，进入肉眼和内部原子的核时代和太空时代，空间和人的视觉，直觉法师活动开始扩大，我们的宇宙的是扩大到宇宙。

1953年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导致分子生物学革命，也使物理学的重大突破总量和量子物理的障碍，其中微电子技术自1970年以来，和激光技术一直在推动新的经济增长和新的工业革命浪潮的来临，长期主要是高科技产业和技术集团的一系列生物审议的基础上。

继第一次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转型过程中，两个科学度，是转型期是由技术和经济的浪潮实现。第二，第三和四下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转型期，第三，第四和五科学和经济转型期，大多下一波技术和这场比赛是又出现了减少的时期的趋势。它很快就变成了科学和技术，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反映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1925年，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在世界上的第一件事，出生于世界工业国的工业革命以来50年的经济周期和长波现象到60年一发现，然后被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和证实，开始发展。体化的生产力。

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现象的发现，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经济，逐步被遗忘，甚至自己。

20世纪的70年代初，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低迷的转变，从战后的石油危机的快速增长，这只是长期期的一半。

人们四处实现，再次发现了长波现象证实了康德拉季耶夫浪潮。

波技术发展的性质，时间分析了由熊彼特的经济长波的原因，世界排名第一的

是首次提出。

他被认为是经济平衡的主要动力是一种新的技术创新活动。

建立一个各种技术（波动性）进入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经济活动，并发挥了不同的行为，是对各种新增加创造性互动的经济发展的不同波长的新阶段制成的发生。

美国学者的德国国籍的门施，在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112 19世纪进行的，从统计分析的应用程序时创建的技术，发明一种新的，新的技术创新频率并得出结论说揭示其长期沿波型时间波长期趋势。

害羞的技术，创造新技术，尤其是铅，可能导致新的创意形成相关技术集团从一个新的创造性的形成时间阿鲁统计组发生的频率要高得多已成为是这一技术的长波。

自然科学的发展浪潮，是体现在科学和科学急剧变化的交替领导的倡议。

克德罗夫前苏联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说过，“科学倡议”要反过来提出的理论，取代的是，在一个单一的科学发现始终有一个群体或一个科学的倡议发挥了科学进步的作用是对科学思想和行动的更换过程。

中国的学者赵先生是，用统计方法“，应采用科学的”，并提出了理论，不断从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上深化移动。换言之，科学发现是跟我的矿物或如果从深入挖掘科学浅应采取的，也是值得的

提取最科学，最容易有人说，科学是能够取得的成就获得。我们是“自然科学的重要年表”，但材料的统计分析，导致现代自然科学的“科技驱动”，这表明，变化是为了转移。

重大成果，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从统计分布的时间获得了。在外壳，科技成果，在综合指数上升趋势人数，大约有解汝四，代表了一个波浪一样起伏。

科学，技术和经济，以及代表在每一时期，这也造成了各个时期之间的转换波变革的浪潮。

科学龙波，即长波和技术经济分析比较长波从一个统计规律，三个彼此的积极方面以下解汝你。换言之，科学，技术和经济是一种之前和之后的一系列沿时间轴发生在某一个历史时期，而且往往增加，是大波转换，形成一个循环。

牛顿力学的基础上，纺织技术，所发生的变化蒸汽技术和机械技术系列，是由在英国，这是第一期的喜悦下列技术的工业革命。

应用力学和化学的发展是促进运输部门转移和冶金和蒸汽技术，机械工程纺织部门，第二阶段和创造性新高潮以下技术和工业革命波及世界，已经从英国和欧洲大陆，第二阶段是美国未来的经济风暴。

电磁学，热能源的开发和有机化工，电子技术，促进创造和新的化学技术和内燃发动机，动力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第三阶段发展，是未来经济风暴打鼓。

核物理，量子物理和相对论的创始人，计算机革命，导致象征原子能和空间技术，其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两个，首次经济崛起，在未来4使得。

DNA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五个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第一领导下的革命，意味着之间的技术和经济的转换过程中出现波动。

科学，技术与经济的转换周期波动规律，有如下几个特点。

换句话说，第一之一，小波变换的历史进程，实质上是科学革命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促进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渐进过程。

二，科学，经济和技术转化和波的速度，是一个趋势，这已成为越来越快，从而科学，就是因为它造成的技术和生产一体化。

三，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波浪经济转型，该系统是在历史进程发展不平衡，是因为他认识到，改变计划，协调发展空间。

赵博士是一个红州北汤浅晶教师和学者对中国学者在日本，如下所示，统计分析，科学活动在世界的中心后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对自己的发现了转移的现象。

意大利1540年至1630年；

英国1660年至1760年；

法国1780年至1840年；

德国1840至1920年；

美国1920- ?

平均周期和动议的科学中心，所有的80岁。

为了分析世界科学，人们当然，中心迁移的原因，是与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的关系提醒。

我们在一场暴风雨的一个解放的哲学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高潮时期，认为是对哲学家和思想家，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的函数，是按照统计曲线获得本。

统计曲线，我们可以发现，在对现代世界哲学高潮下列国际转移现象。

意大利1480至1640年；

英国1600年至1730年；

法国1710 年至一八二零年；

德国1790年至1880年；

在一个单一的国家哲学高潮，具有 120 年的平均搬迁期间，与 80 年的平均水平和平科学的国际转移和国际转移的哲学世界的中心，在世界上高潮，代表相关性。

很早就从科学哲学中心的风暴潮，平均为 60 年。

哲学的迅猛增长阶段的国家之一，这是比第一次科学中心更快，而且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哲学的激增，科学往往上升为两大一这表明了作用，思想运动，宗教思想和神学教条的腐败摆脱封建保守思想的科学结合，以便为科学发现的自由之路意思。

并领导了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促进科学活动在意大利的出现是由伽利略为代表，和唯物主义哲学的科学实验和归纳方法培根主张，成为科学和英国的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代表是牛顿，消除障碍，经院哲学科学，法国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式的运动卢梭和狄德罗，达朗贝尔代表在法国引起了科

学家的科学发现拉普拉斯任务组的繁荣，而且，康德，谢林和，费希特，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费尔巴哈是斯特拉多尼茨，在德国和李比希和沃勒领导科学活动，撒猪多的种子，初步感觉从开始超车。

对科学的黄金时代发展会期间的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一个步骤，英国是法国和德国的研究在三个国家，三个国家的情况，最“社会革命风暴潮——科学的哲学”的你可以找到事实根据已制定的示范秩序。

例如，法国所主张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原因，首先是在 1789 年编写的思想理论性，多年来，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革命，为联合法国科学发展的思想提供安全和体制的基础上，与这三个因素有关，是对创造和科学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在法国的工业革命发展的必要基础。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科学—工业”三国过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典型的波浪变形，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的模式，不一定能解礼我们，一个普遍的多因素，同时为对历史规律的经济转型的多元综合波链—科技—简化抽象和早于一个生动的例子历史复杂的社会因素，而这些丰富的历史内容的注入。

人们可以品尝它一样从下面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种类繁多的元素，在一个社会中共存于同一时期在历史的进程中，“思想—政治—科学—技术—经济”是许多元素，并围绕着一系列相互彼此也时间形成一个发展链出现。

对法律，历史，科学和中国传统的封建缓慢的原因，并逐步前波转换技术，然后去香港是否发展，科学和欧洲的技术，为什么中世纪时期失败者，相反，现代的问题：为什么你不仅的原则和具体的变化和未来的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元素转换趋势预测指导重建提供。

所以如此，这项法律，保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战略，战略研究和开发工作的领导，由它提出的设立也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关键这是。

当您设置的发展战略的道路，但您在中央的地位和经济建设的物质投入生产，并应确定其对这一波变革道路上的战略和业务内容的时间顺序实际国家等级划分法，这也将通过一个元素的所有元素的相对不平衡发展，和谐发展取得的主导害羞是一个需要从一个和谐的未来发展不平衡时得到进一步表示。

根据对科学中心搬迁期间，美国，作为科学在2000年左右的中心位置，将告一

段落。然而，冷战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匹敌的国家作为科学和经济强国的地位是不存在。

21世纪，什么是科学中心在哪里？什么将是未来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中心？同样，你也可能是美国？或日本是否会？欧洲将如何？什么中国？或者，北美，欧洲，东亚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中央新时代国家将出生在多边竞争的过程？」。

并且，同时还在这些研究中引入了中日比较，将中国的“中体中用”→“中体西学”和日本的“和魂汉才”→“和魂洋才”在扩大的循环中加以说明。这方面对本研究起到启示作用的是巴库，以中国人的“无变化引入”与日本人的“有变化引入”这一句话进行比较考察，这两者的行动无疑也可以从两者所处的漫长的历史、地理环境的差异加以充分地说明。

1·4 研究概况

1·4·1 欧美的研究者主要有：

①布拉修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5])、②李约瑟 (Needham, J, [2])、③费尔巴克 (Fairbank, J, K, [8])、④爱克斯坦 (Eckstein, A, [12]) 及巴库 (Buck, P, S, [3]) 等等，但一般他们的研究基本上都带有以欧美为标准的主观倾向。

其中比较客观进行分析的要数布拉修和巴库。布拉修是有名的环境决定论者。巴库虽然是一个文学家，但他对中国内部有深远的洞察力，在中日文化比较上也卓有成效。

而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则是李约瑟。他对在许多领域创造出世界最早、最优秀科学技术的中国，提出了为什么后来没有太大的发展这样的问题，并且，做为这一问题的回答，他断言道：“由环境产生的东西，相反也会由环境阻碍其发展”。这一结论应受到一定评价。

1·4·2 中国的研究者有：

① 赵思希 [47]、②林语堂[34]、③刘则渊教授 [48] 等。赵思希强烈批评了欧美人对中国观的欧美标准，同时，以客观的标准按照历史事实真实、详细地

叙述了中国古代贸易史。而林语堂及刘则渊教授则从本质上说明了环境对中国人观点及活动形态的影响，这与本研究中的循环的一部分也是一致的。

1 · 4 · 3 日本的研究者有：

①根岸结[15]、②中村元[17]、③津田左右吉[19]、④家永三郎[23]、⑤冈田武彦[16]、⑥贝冢茂树[21]、⑦和辻哲郎[22]、⑧福泽谕吉[26]、⑨今堀诚二[28]、等等。其中主要以明治时期“脱亚入欧”这样一个日本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人为主，他们大多具有欧美志向的偏向倾向。随着21世纪的接近，也出现了许多进行客观分析的研究者。

与本研究关系紧密的是；①他的“在中国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变化的。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从属的……总之要研究中国，归根结底要研究中国人”这一主张非常值得倾响。

注：

- (1) 引自大辞林 [44] P. 539。
- (2) 见布拉修 [5] P. 53。
- (3) 详见和辻 [22] PP. 24~120。
- (4) 津田 也有相同指出，见津田[19]P. 202。
- (5) 这个分类根据冈田[16]，详见冈田[16]PP. 115—124。
- (6) 见林语堂 [34] P. 52。
- (7) 见林语堂 [34] P. 71。
- (8) 见林语堂 [34] P. 282。
- (9) 见兰古 [33] P. 13。
- (10) 引自中村 [17] PP. 202~203。
- (11) 参见中村 [17] PP. 203~204。
- (12) 见毛泽东 [45] P. 103。
- (13) 见毛泽东 [45] P. 103。
- (14) 参照凯恩斯 [43] PP. 2~4。
- (15) 在吴承明 [38] 中指出：很久以来在中国，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应具备生产的全过程这种观念较为普遍，这是无视或轻视商品经济与市场的作用，其结果造成商品不足与供给不足。参照P. 7。
- (16) 见毛泽东 [45] P. 105。

- (17) 在中国，这种极端精神主义口号任何时代都可以看到许多，其例举不胜举。
- (18) 布鲁金格斯研究所的巴耐特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提出给予 1949 年以来中国最大的转折点的的评价。他认为，即使有某种程度的调整，中国今后也将走独自的市场社会主义道路，不会回到 1976 年前的中国。参见〔8〕的 11 月号，P. 20。
- (19) 爱克斯坦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外贸的具体原因是强烈的内陆志向，即中国有 6 个比近邻国家还大的省，中国的贸易依然是国内市场志向型，没有面向海外，这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见爱克斯坦〔12〕PP. 3~8。
- (20) 见爱克斯坦〔12〕P. 6。
- (21) 相同内容在〔31〕P. 2 也有。
- (22) 见爱克斯坦〔12〕P. 4。
- (23) 这个条约于 1980 年 4 月废止了。
- (24) .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一边倒是总结孙中山四十年的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的经验得到的教训。我们深知，要想到达胜利、取得胜利就必须一边倒。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民不是帝国主义一边倒就是社会主义一边倒，决没有例外。骑墙头是行不通的，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一边倒的蒋介石反动派也反对对第三条路抱有幻想。”详见毛泽东〔45〕P. 464。
- (25) 这是指平均主义和征物移用的做法。却生产的商品，甚至生产资料未经本人同意便随便移到需要的地方去的做法。见吴承明〔38〕PP. 8~9。
- (26) 1957 年 7 月，英国采取了对中国放宽的政策，中国开始与英镑圈接触。
- (27) 北京周报〔46〕1981 年第 6 号登载：“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前提的对外开放经济政策、反霸权主义、拥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不变”。另外，〔46〕1981 年第 8 号谈到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时阐述道：中国通过国际市场的交流和外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才能提高国内的生产力、活跃国内市场、强化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参见〔46〕P. 21 和 P29。
- (28) 详见拙著〔30〕PP. 47~48。
- (29) 日本经济新闻，2002 年 1 月 13 日。
- (30) 见今堀〔28〕。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将错觉分类为旧关系所带来的历史错觉、地理相近所产生的地理错觉及人种错觉、文化错觉等等的话，各种问题便可以得到很好的理顺。陆井〔29〕也有同样观点。见〔29〕。
- (31) 见野村〔24〕P. 52。
- (32) 见野村〔25〕P. 38。
- (33) 自贝塚〔21〕P. 316 的引用。贝塚自认为是中国崇拜者，同时也表示了对日本文化的自信。见〔21〕PP. 362~367。
- (34) 见巴特费尔德〔13〕P. 6。

- (35) 即使努力去了解，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封闭性经常成为障碍。但像原苏联那样的“Potemkin Village Strategy”现象被误解为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战略，这是劣等国家对待其他国家采取的一个战略，决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战略。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其他特殊国家，只要是劣等的，便要去掩盖，来采取这种战略。
- (36) 参照津田[20] PP.202~317。其中，他反对将日本文化列入东洋文化之中，对同文同种也持异议。对于结论可以同意，但一部分表现出的偏见倾向无疑成为问题。家永氏指出：战前津田对中国蔑视与其他明治时期的人同样，是由于把中国思想看作为妨碍日本进步的前近代思想中强有力量的一个，对中国的蔑视被做为观念世界的问题，同时，也出自于做为日本勇敢挑战前近代思想的武器这样一种论理关系上的早期必要性。详细请见家永[23] P.455。另外，关于结论，沟口[29] PP.19~38中虽是消积的也有与家永相同的观点。
- (37) 引自和辻氏[22] P.225。
- (38) 见福泽[26] PP.325~326。
- (39) 见津田[19]和辻[22]。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津田一般被认为是极强偏见的代表者，这一点受到过许多的强调，但对其做为敏尖思想家所做的一些分析评价不足。例如，他也表示出与我们共同的基本态度，即“这表示中国思想离开中国的特殊政治形态、特殊的社会组织、以及中国人特殊的生活、特殊的心理的话便失去意义”。详细内容参照津田[20] PP.202~203。
- (40) 见爱德拉[10]的序文。
- (41) 参照费尔班克[8] PP.183~190。好意的偏见代表者有[8]巴库。
- (42) 参照爱克斯坦[31] PP.3~36。
- (43) 对中国观中常引以例证的没法子论也可以说明同样内容。从好意上讲，它是对天命论产生的命运的不动摇精神和埋藏于深处的强有力能量。恶意讲的话，它与无气力有关。关于没法子论的考察请参照尾藤[18]的 PP.322~325。
- (44) 见米勒[4] P.1。
- (45) 见米勒[4] PP.1~2。
- (46) 见根岸[15] PP.6~7。
- (47) 见赵思希[47] P.125。
- (48) 见赵思希[47] PP.126~128。
- (49) 朝日新闻 1995年4月5日晚刊。
- (50) 同上。
- (51) 见李约瑟[2] PP.24~25。及[1] PP.149~150。
- (52) 见李约瑟[2] PP.24~25。及[1] PP.149~150。
- (53) 见刘[49] PP.86~95。

- (54) 见巴库[3].
- (55) 见赵思希[47].
- (56) 见林语堂[34]和[35].
- (57) 见根岸[15] PP.6~7.

参考文献

- [1] Yamada, M,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gram in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edited by Gray, T, and White, G, Academic Press, Inc. (London) LTD, 1982, PP.37~54.
- [2] Needham, T,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Kinseido, LTD, Tokyo 1970.
- [3] Buck, P. S, China-Past and Present, edited with Notes T. Shirai, Shinozaki Shorin, 1979.
- [4] Miller, A. and Morath, I., Chinese Encounters, edited with Notes by K. Yamaji, Shinozaki Shorin, 1980.
- [5]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Prinsiples de Humaine, Publec's daspre's Les Manusrits de l' Auteun Par Emmanuel de Martonne, Armand Colin, Paris, 1922 (饭塚浩二译《人文地理学原理》, 岩波书店, 昭和50年)
- [6]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Volume I、Introductory Orientation, The Syndic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ngland, 1954(矿波护, 杉山三郎, 胁本繁, 田边胜美共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序编》, 思索社, 1974年)
- [7]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The Syndic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ngland, 1956.(吉川忠夫, 佐藤保, 木全德雄, 岛尾康共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2卷思想史·上》思索社, 1974年)
- [8] Fairbank, J. K., 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U.S.A. Cambridge, 1967.(工藤沈吉译《人民中国论》读卖新闻社, 昭和45年)
- [9] Needham, J,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Lectures and Addresse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山田庆儿译, 《东西学者与工匠·上》, 河出书房新社, 昭和49年)
- [10] Adler, S., The Chinese Econom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57(本桥渥译《中国经济》, 岩波书店, 1958年)
- [11] Barnett, A.D., Uncertain Passage; China's Transition to the Post Mao Er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4.(石川忠雄, 山田辰雄共译, 《中国——毛泽东以后的过渡期——》, 鹿岛出版会, 昭和51年)

- [12] Eckstein, A.,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石川滋监译, 《中国的经济革命》,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0年)
- [13] Butterfield, F.,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Times Books, 1982(佐藤亮一译, 《中国人·上卷》, 时事通信社, 昭和58年)
- [14] 同上, 《中国人·下卷》。
- [15] 根岸侑著, 《买办制度的研究》, 日本图书株式会社, 昭和23年。
- [16] 冈田武彦著, 《中国和中国人》, 学出版, 昭和48年。
- [17] 中村元著, 《比较思想论》, 岩波书店, 1960年。
- [18] 尾藤正英编, 《日本文化与中国》, 中国文化丛书第10卷, 大修馆书店, 昭和43年。
- [19] 津田左右吉著, 《支那思想与日本》, 《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卷·历史学与历史教育》PP195~335, 岩波书店, 昭和40年。
- [20] 津田左右吉著, 《谈支那思想》, 《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3卷·论丛(=)》PP451~453, 昭和40年。
- [21] 贝塚茂树著, 《何谓中国》, 《贝塚茂树著作集·第10卷·孙文与毛泽东》PP281~333, 中央公论社, 昭和53年。
- [22] 《和辻哲郎全集·第8卷·风土——意大利古寺巡礼》PP121~168, 岩波书店, 1977年。
- [23] 家永三郎著, 《津田左右吉的思想史研究》, 岩波书店, 昭和47年。
- [24] 野村浩一, 《日本与中国·日中问题的思想课题》, 《世界》第304号 PP35~52, 岩波书店, 1971年。
- [25] 野村浩一, 《中国革命与革命中国》, 《世界》第310号, PP38~49, 岩波书店, 1971年。
- [26] 福泽谕吉著, 《本素世界国尽·福泽谕吉集》PP3~8, 《唐人往来》同书 PP325~330, 筑摩书房, 昭和52年。
- [27] 沟口雄三, 《中国公私概念的展开》, 《思想》NO.669PP19~38, 岩波书店, 昭和55年。
- [28] 今掘诚二, 《中国革命和毛泽东选集》, 《现代与思想》季刊 NO35PP156~177, 青木书店, 1979年。
- [29] 陵井三郎, 《反革命战略‘缓和’与中国外交》, 《现代与思想》季刊 NO35PP20~57, 青木书店, 1979年。
- [30] 拙著, 《日中贸易论》, 北九州贸易协会, 1981年。
- [31] Eckstein, A., Galenson, W. & Liu, T. (ed.), Economic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 Aldine Publishing Co, Chicago, 1968.
- [32] Wittfogel, K.A.,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Versuch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nalyse einer guossen asiatischer Agrargesellschaft,

- EnsterTeil.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u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at Frankfurt a. M. Verlag Von C.L.Hirschfeld Leipzig, 1931. (平野义太郎监译, 《新订·解体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与社会(二)》, 原书房, 1977年)。
- [33] 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小川修译, 《中国的家庭与社会》, 岩波书店, 1953年)。
- [34] 林语堂《东西的国民性》, 鱼返义雄译, 增进堂 1946年。
- [35] 林语堂《我国土、我国民》, 新居格译, 丰书院, 1939年。
- [36] 沙米鲁·马民《南北问题的本质》, 《经济评论》第30卷第9号, 日本评论社, 1978年9月。
- [37] 小竹文夫《中国的自然与文化》, 弘文堂书房, 1947年11月。
- [38] 吴承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现代化》, 《亚洲经济旬报》1150, 中国研究所, 1980年5月上旬号。
- [39] 丸山伸郎《中国的经济系统与现代化》, 《经济评论》9月号, 日本评论社, 1980年9月。
- [40] 小宫隆太郎《现代中国经济》,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9年2月。
- [41] 南亮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90年9月。
- [42] 和辻哲郎著《季节风风土的特殊形态》, 《和辻哲郎全集·第8卷·风土——意大利古寺巡礼》PP121~169, 岩波书店, 1960年。
- [43] 凯恩斯(Keynes, J.M.)The End of Laissez-Faire & A Short View of Russia, Kenkyusha Modern English Readers 27, Feb, 1981。
- [44] 大辞林, 三省堂, 1989年3月。
- [45] 同书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浅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11月。(坂元广子译《毛泽东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入门》, 长崎出版社, 1976年5月。
- [46] 《北京周报》1980年第5, 7, 9, 22, 34, 36, 41, 46, 50号及1981年第1, 4, 10, 14号, 北京周报社。拙著《日中贸易论》, 北九州贸易协会, 1981年6月。
- [47] 赵思希“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AMS PRESS, New York, N.Y. 10003, 1970。
- [48] 刘则渊《论科学技术与发展》,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7年
- [49] 刘则渊《现代科学技术与发展导论》,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年